



刘文鹏 著

埃及考古学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埃及考古学

刘文鹏 著

K884.11
V1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 2008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埃及考古学 / 刘文鹏著.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08.4
ISBN 978-7-108-02842-6

I . 埃... II . 刘... III . 考古学—埃及 IV . K884.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54144 号

责任编辑 张艳华
装帧设计 罗 洪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盛通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8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08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2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 34
印 数 0,001—5,000 册
字 数 350 千字 图片 351 幅
定 价 69.00 元

序

这一部书，是中国人自己撰述的第一部《埃及考古学》，也是我国著名世界古代史专家、埃及学家刘文鹏教授（1931—2007）的最后一部遗著。他在今年4月写成了此书的自序《走进法老的世界》，到5月29日凌晨，便走完他的人生历程，离开了这个世界。根据他的遗愿，我现在来为此书作序，几度执笔泫然，不知从何说起。

文鹏教授和我，是1955—1957年在东北师范大学由苏联专家格拉德舍夫斯基主讲的世界古代史教师进修班上的同学，他是我们班的班长。他为人忠厚，待人诚挚，自律甚严，勤奋笃学，是一位好班长。他于1953年从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即考入林志纯先生为导师的世界古代史研究生班，1955年以优异成绩毕业，遂留本校工作。刚工作不久，即又奉学校之命，考入由苏联专家主讲、由林志纯先生协同指导的进修班脱产学习。1957年，他又以优秀成绩从进修班毕业。至此，他已经连续四年专门研习世界古代史的经历，并且发表了一些学术论文，是一位学有根底并初露头角的青年专家了。

当时办这些研究生班或教师进修班的目的，都是为了培养高等学校历史系所急需的新一代世界古代史教师，所以总体要求对

专业基础掌握比较全面，而在个人研究领域则可以各有专长。当时的世界古代史大体分为原始社会、古代东方、希腊和罗马四大部分。文鹏即选定以古代东方中的西亚北非古史为其研究重点，他在上世纪 50—60 年代所发表的学术论文与译作主要(但非全部)就在这个领域。相对于传世历史文献较为丰富的希腊、罗马史而言，古代东方史的研究难度要大很多。文鹏选择了知难而上，也显示了他的学术性格。

在“文革”中，他经历了下放插队，至 1972 年调入通辽师范学院(今内蒙古民族大学)任教。他和最器重他的老师林志纯先生开始分属两校，不过在业务上仍然亲密合作无间。1973 年，他被临时借调到北京商务印书馆，协同林先生修订《世界通史资料选辑》(上古部分)。同年，吉林师范大学历史系排印出林先生所编《世界古代史(上册)》(初稿)，这是林先生经过深入反思，努力改变过去沿袭苏联教材体系的新尝试。林先生日夜搜寻、阅读国外关于古代史的新著，经常约他的几位早期学生一同商讨。文鹏就是其中重要成员之一。到“文革”后期，林先生决定编写《世界上古史纲》，由几位学生参考他所编《世界古代史(上册)》(初稿)编写有关诸章。文鹏分工担任其中“古代埃及”章的编写。从此文鹏即集中主要精力从事古代埃及史的研究，垂四十年。到 20 世纪末，他已发表了多篇高水平的学术论文，以及《古代西亚北非文明》(主编)、《古代埃及史》(独著)等专著。同行学者认为：“他的论文和专著反映了我国埃及学的最新研究成果，也是我国埃及学到目前为止的最高成就。”

不过，文鹏教授并未到此止步，而是如他自己所云“老翁不倒再登攀”。他在新世纪继续登攀的主要成果就是这一本《埃及考古学》。他为此书已经做了多年准备，到此书写作的后期，他已经不幸积劳成疾。他在自序中说：“原本预定四年完稿，却因近年身体欠佳，病魔缠身，无奈又拖延了一年。而且对于后埃及，特别是希腊、罗马时代的埃及考古学部分的写作实在无力继续下去，只好在阵阵病痛中潦草地结束，实在抱歉。”每读至此；难禁泪下。

文鹏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文鹏不幸过早地逝世，来不及见到此书的出版，的确是一件令人不胜遗憾的事。不过，文鹏的学术志业却是富有生气的。他的埃及学研究是与他的教学工作相辅相成的。自研究的角度看，从《古代西亚北非文明》、《古代埃及史》到《埃及考古学》，是学术本身向深度发展的进程；自教学的角度看，这也是他培养学术继承者的过程。在通辽这个原来缺乏基础条件的地方，文鹏于1991年在内蒙古民族师范学院成立了古代埃及史研究所，十余年来，他用自己献身学术的诚挚精神与笃实学风，感召并培养了相当可观的一批以世界上古史和埃及史为志业的弟子。他们中的一些人现在已经在北京、上海、天津、长春等地的研究机构与高等学校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还有一批正在上述各地的大学里攻读博士学位，沿着文鹏的学术道路前进。这样看来，文鹏的未竟之业，必定后继有人，发展有望。

埃及考古学在中国，现在尚在筚路蓝缕阶段，文鹏的《埃及考古学》正是首启山林之作。所以，这本书不仅很有益于我们的古代埃及史的教学与研究，而且给我们开拓了一片学术领域的希望。

同学弟 刘家和 再拜谨叙

2007年8月初稿

2008年1月改订

走进法老的世界（自序）

法老世界的埃及，今天已不再令人陌生。那巍峨的大金字塔，高耸的卡纳克神庙，神秘的帝王谷，千年不朽的木乃伊，还有那川流不息的尼罗河……早已成为古埃及文明的遗产或法老埃及的象征。正是这样一些绝无仅有的人文和自然景观，每天吸引着成千上万的各国游客和学者走进延续了四千多年的古埃及法老世界。

法老世界早在公元7世纪阿拉伯人入居古埃及后便已消逝了。如今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法老世界，应该归功于埃及学家，特别是那些孜孜不倦的考古学家的发现和研究。但是，在现代文明的世界上，科学技术日新月异，而埃及考古学却让人们感到有些陌生而疏远。这对于埃及学者来说，不能不说这是遗憾。

今天，我奉献给读者的就是一部简略而初步的埃及考古学著作的尝试。为什么要写一部埃及考古学，能不能写出一部埃及考古学，这是我多年思考和研究的课题，也是我多年希望完成的夙愿。

近年来，我一直从事埃及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在教学与研究工作中，总是离不开埃及古代史、埃及考古学、古埃及语言文字，以及宗教、文化等。但是，为了教学的需要，我首先给我的研究生提供了一部《古代埃及史》（商务印书馆，2000年）。在古埃及史的教学之外，我还开设了埃及考古学的课程。埃及考古学对于

学习历史的学生而言，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艰涩枯燥的。因为它涉及一些考古专业的术语以及各种必要的数据、建筑的设计、配套的画面等等。学生们学习上的困难使我不得不考虑再给他们提供一部综合性的、系统的埃及考古学教材。另一方面，我的《古代埃及史》在出版时，建筑、艺术等方面的内容被大量删减，也需要做些补充。但是，要想写出一部埃及考古学，却让我感到棘手而无从下笔。原因是，目前我能搜寻到的参考书，可以说是寥寥无几，要想找一本埃及考古学著作作为蓝本，更是难上加难。

早在 1887 年，马斯帕洛发表了一部法文的《埃及考古学》，后来被译成英文多次发行，但现在很难看到。目前，我能见到的唯一的一部英文《埃及考古学》，就是 T.G.H. 詹姆斯在 1972 年发表的。但这部埃及考古学并非综合系统的论述，而是包括了几个重要的专题：埃及史概述、真正考古学的开端、发现金字塔、刻苦的考古学的巨大成就、伟大的人及其等级、希克索斯人的入侵、黄金的埋藏等。此外，在我所见到的法文著作中，有一部《埃及考古学手册》，是由 J. 范迪尔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发表的。书中的内容包括第一卷：形成的时代——史前；第二卷：伟大的时代——丧葬建筑；第三卷：雕像；第四卷：浮雕和绘画——生活场面；第五卷：浮雕和绘画——生活场面；第六卷：浮雕和绘画——农业生活场面。这部六卷本的考古学手册，基本上是以建筑和艺术为主，内容有一定的局限性，也并非一部理想、全面的考古学著作。特别值得提到的是，在 20 世纪 50 年代，埃及的专家穆斯塔发·埃米尔来中国讲学，留下了一部中文的《埃及考古学：埃及的古代建筑、雕刻与绘画》（1959 年，科学出版社）。这部讲稿也把埃及考古学局限于建筑和艺术方面，显然是保留了国外传统的写作体例。但是，这种写作方法和内容毕竟与我所要求的有差异。

事实上，现在大约有一百个来自不同国家的考古队在埃及进行每年一次的发掘，其所发表的考古发掘报告和著作数不胜数，但绝大部分都是某一地区、某一城市、某一遗址或某一专题的报

告和研究，从中很难找到一部综合性的、系统的、全面的埃及考古学专著。

然而，意想不到的是，最近收到了两部日文版的埃及考古学著作，让我兴奋不已。其中一部是酒井傅六译的 T.G.H. 詹姆斯的英文版的《埃及考古学》；另一部是近藤二郎著的《埃及的考古学》（1997 年，同成社出版）。后者是日本出版的《世界的考古学》之一，大约有二十万字关于埃及考古学的概述。这部著作简明、系统地论述了埃及考古学不同时期的巨大成就。应该说，这是一部有价值的参考书，尤其在希克索斯时代的考古部分（在我的这本书中，原计划有这一部分内容，但缺少足够的资料，所以删去了这一节）做了必要的论证。遗憾的是我的书稿已定，而且目前无力参考学习做些修补。但是我愿把日文版的《埃及考古学》的目录翻译出来，以资借鉴。这部著作除了序言和结语之外，共计十章。第一章：农耕、畜牧之开始与陶器之出现；第二章：统一王朝的出现和早王朝时代的王墓；第三章：金字塔的产生和演进；第四章：奥西里斯信仰和阿拜多斯；第五章：希克索斯的统治和推尔·达巴的遗迹；第六章：帝王谷和新王国时代的王陵；第七章：新王国时代的都城；第八章：新王国时代的底比斯墓地；第九章：“海上民”之活动与东地中海；第十章：塔尼斯的王墓和第三中间期的墓制。这部著作的内容比较丰富，但是，其不足之处是缺少神庙建筑以及艺术方面的内容。

为了给学生们一个关于埃及考古学整体、系统、基本的概念和知识，我不得不写出一部自成体系的埃及考古学教材。这部教材的年代范围包括史前时代、法老时代、希腊、罗马统治埃及的时代，但主要是法老文明时代；其内容涉及了史前埃及文化的演进、城市文明与聚落形态、宗教文化、陵墓、建筑（包括宗教的和世俗的）、艺术创作以及丧葬习俗等。写成这样一部教材，实际上是在我多年的教学实践中不断撰写、修改、积累的基础上，最后加工完成的。但是，限于个人的专业水平以及某些客观条件，原本预定四年完稿，却因近年身体欠佳，病魔缠身，无奈又拖延

了一年。而且对于后埃及，特别是希腊、罗马时代的埃及考古学部分的写作实在无力继续下去，只好在阵阵病痛中潦草地结束，实在抱歉。鉴于上述情况，这部书稿难免有些错误和不当之处，敬祈学界同仁及广大读者赐教。

现在奉献出来的这部《埃及考古学》究竟有无价值，或者有多大价值，我不敢断言，但毕竟是一个尝试。中国的埃及学已经迈开了第一步，主要是开展了古代埃及的历史、文化和语言范畴的研究，但还谈不上埃及考古学的起步。至今，我们还没有派遣考古队前去埃及合作发掘工作的实践，即便是我写出了这一部《埃及考古学》，而最大的遗憾就是我也没有埃及考古发掘的实践，至多不过是到埃及各地参观，考察了重要的考古遗址、遗迹，到各个博物馆观察一些主要的文物和文献，而且仅仅拍摄了部分文物、遗址照片，只能说是有了些直观印象。

中国和埃及都是世界上古老的文明古国，中埃两国古代已经有了直接或间接的交往。公元 13 世纪，我国南宋时代赵汝适写的《诸蕃志》中已经提到了亚历山大里亚（徂葛尼）的灯塔，并做了详细论述。唐朝时期创建，几经修复的泉州开元寺，在其大雄宝殿前台束腰石上的狮身人面像浮雕，使我们看到了埃及斯芬克斯的踪迹。在我们内蒙古巴林右旗的庆州白塔塔身上的人头鸟身的所谓“全翅鸟”或者名曰迦陵鸟的浮雕像，让我想起了古埃及的精灵“巴”的形象。

除了我国建筑上显示的两大古老文化的交流或影响之外，晚清以来，我国的官员前往欧洲考察的途中曾经在埃及逗留，不仅参观了大金字塔，而且回国时搜集了一些文物，带回了一些重要的文物和浮雕拓片。尤为重要的是，中国金石学家端方搜集和购买了“原石，总数四十多件”。有些图片先前已在《新观察》杂志上发表（1957.2）。还有些文物和拓片保存在故宫博物院或国内图书馆等单位。在私人手中也有部分收藏，本人也从朋友那里复制了几份文物和铭文的拓片。有一件碑铭拓片（原件 79 厘米 × 44 厘米）的内容，主要是死者向奥西里斯贡献祭品，还有一件费乃



图1 埃及墓碑拓片复印件



图2-1 埃及石棺图片正面铭文拓片的复印件

汉姆瓦特(女)木乃伊石棺铭文的拓片，石棺原件177厘米×66厘米。我所收藏的第三件拓片复印件，保留了三行铭文，原件108.5厘米×18厘米。在拓片的右侧题有“埃及古人胄图刻字拓奉”字样，左侧为“砾臣尊兄鉴存端方题记”。这三行铭文拓片，从文字和风格上判断，当属于希腊、罗马统治时代，是照耀地下落日的一篇颂词。

本人手中最后一件拓片的复印件，是一篇简短的献祭祭品清单（第一部分）和献祭的惯用语断片（第二部分），原件为33厘米×27.5厘米。值得注意的是，落款为“埃及五千年古刻拓奉立堂仁兄世大人正鉴，丁未八月端方记”，此外，还有景椿山房主人补题：“埃及国居热带，开化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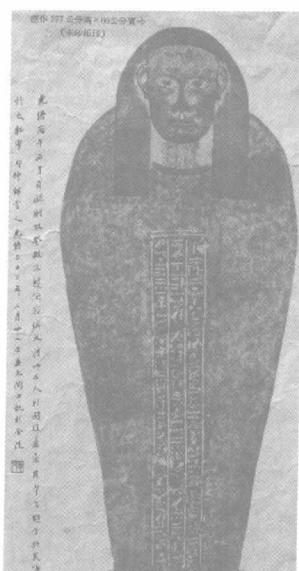


图2-2 埃及石棺图片



图3 祭品清单和献祭惯用语拓片的复印件

早，石刻艺术极堪欣赏。端子拗先生癖于好古，搜罗甚富，故有此种远地奇异拓本，物必聚于所好，信然。溯自苏伊士运河凿通，埃及已成强英控制殖民区域。但埃及有此种历史文明，民非愚昧，时势变迁，当有复兴之一日，是看埃及人士振奋何如。民国甲子花朝。”这份补记不仅说明了先人对埃及文物和文明的赞赏，也表达了中国人对殖民统治下埃及的复兴和振奋的期盼，显示了两大

古老文明国家的友情。

在 20 世纪 30 年代，夏鼐先生前去英国伦敦大学考古学院埃及学系学习埃及考古学。在解放前的旧中国显然没有条件从事埃及考古学的研究工作，但是夏鼐先生利用埃及考古学的知识从事中国考古学的研究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同时也一直关心埃及考古学的研究。

中国的埃及考古学何去何从？这是我们中国的埃及学者不能回避的、不能不认真思考的课题。在 21 世纪的今天，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作为古老文明的中国，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创建和发展中国的埃及考古学，已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在我国已有的埃及学基础上，发展中国的埃及考古学，我们需要有一批年轻学子从事和热爱埃及考古学专业，也期望有朝一日，派出中国的埃及学者前往埃及，与其他各国的同行并肩协作，参加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建立一支中国的埃及考古学队伍，为在埃及考古学的发展中占有一席之位，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最后，必须提到的是，在这部著作的写作过程中，得到了我校领导、同事们的支持，还有我的同窗好友的关照。我的两位师兄，刘家和教授一直关注和支持我的撰写工作；毛昭晰教授每逢访日总是搜集有关古埃及的日文书籍赠送给我，特别是最近，他又送给我上面提到的两部埃及考古学专著。我的学生，北京师范大学的王海利博士，也提供给我多部英文著作。所有这些，都给我的写作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在此，我向所有关心、帮助过我的领导、同志、朋友们，表示深深的谢意。

还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种种原因，没能再次专访埃及。原想配合这部著作再拍摄一些文物、遗址、遗迹照片的计划落空了，所以，除了少部分是我多年前出席开罗国际埃及学会议到埃及各地拍摄的照片之外，绝大多数的照片都是从我所参考的英、日文著作中选择、拍摄的，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作者 谨启
2007 年 4 月于通辽

导 论

埃及是一个具有五千多年悠久文明历史的伟大古国，在世界历史的发展中，它为人类留下了丰富而宝贵的文明遗产。古埃及文明不仅在古代世界历史舞台上占据了重要地位，而且对周边的地中海诸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以至我们在现代世界的社会生活中，还能看到古埃及文明的某些蛛丝马迹，使我们领略到古埃及文明那古老悠久的历史文化及其伟大的贡献。研究古埃及的历史与文化，首先要依赖于埃及考古学，以及以考古学、语言学为基础的埃及学。因此，在此我要阐述埃及考古学研究的对象、时间和空间范围，以及埃及考古学与埃及学的关系。其次，有必要介绍埃及考古学的起源、发展与现状。最后，还要论述埃及考古学的分期问题。

一、埃及考古学研究的对象、时间与空间范围

(一) 考古学的定义与特点

在我国现行通用的“考古学”一词，是从西方的文字术语翻译过来的。英文中的“Archaeology”，法文中的“Archéologie”，德文和意大利文中的“Archäologie”，俄文中的“Археология”等词几乎没有什么区别，都意味着“考古学”。这些词显然都是源于古希

腊文的“*Aρχαιολογία*”，而希腊文中的这一术语又是由“*ἀρχαῖος*”（古代或古物）和“*λόγος*”（科学、学科）构成的。古希腊文中的“考古学”一词最初泛指古代史或古物的研究。从17世纪以后到19世纪，“考古学”一词的含义逐渐扩大或改进，泛指对一切古物和古迹的研究。

在我国古代，涉及“考古学”内容的术语，最早是公元一二世纪东汉时期的“古学”，即古文经学。在11世纪的北宋，出现了“金石学”。到了清代末期，金石学又被称为“古器物学”，“古器物学”已接近近代考古学的含义，但并不能完全等同。

考古学，作为一门科学，属于人文科学的领域，是历史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C.M.梅格汉认为，所有的考古学都是历史学，它是记录和阐明过去事件的知识的分支学科，但不是所有的历史学都是考古学。考古学是从事物——常常是从片段的事物推断出历史结论的学科，它是对人类已往生活和活动的物质遗物的研究。^①由此可见，考古学并非以文献史料为依据，也不包括直接的关于历史事件的叙述，而是根据调查、发掘或发现的人类活动所遗留下来的物质遗物（工具、武器、器具、艺术品甚至人与动物的骨骼等）和遗址、遗迹（王室、民宅、陵墓、寺庙、城镇、聚落等）进行研究。既然考古学是公布和研究考古发现物及发掘出来的遗址遗迹，并以这些考古资料为依据，以恢复人类历史的过去，那么考古学便不等同于历史学。随着考古学的发展，除通常的田野考古外，还出现了水下考古，甚至航空考古等新的手段。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出现的所谓“新考古学”，其研究的时间、空间范围不断扩大。所以，有的考古学者在传统的“人工遗物考古学”之外，又提出了“文化体系考古学”、“空间考古学”等新概念。^②还有一些学者通过引进其他先进科学的方法和手段，创造了实验考古学、环境考古学、科技考古学、计算考古学、遥感考古学等边缘分支学科。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遥感考古学，它利用空间运载工具和现代化的电子、光学仪器，采用计算机分析方法，探测远距离的研究对象。但是，不论出现哪些分支学科或流派，

① C. W. Meighan, *Archaeology: An Introduction*, Chandler Publishing Company, 1966, p.1.

② 田边勝美监译，《世界考古大图鉴》（*Le Grand Atlas de l'archéologie*），同朋舍出版，1987年，第15、16页。

考古学的本质内容及其基本概念是不能改变的。

既然考古学是记录和阐明过去事件的知识学科，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的考古学都是历史学，但并不是所有的历史学都是考古学。历史学家并非通常需要使自己掌握物质遗物，以重建原先的过去，而是期望利用广泛的口头的或文字的记录进行研究。但是，考古学家处理人类发展史的总跨度，其百分之九十九是非成文的史料，而仅有百分之一是有成文记录的文献。^①由此可见，考古学对于研究无文字时代的历史，具有特殊的意义。

考古学既然是进行历史研究的，那么历史研究的最终目标又是什么呢？历史科学——作为现代的历史唯物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是“把历史看作人类的发展过程，而它的任务就在于发现这个过程的运动规律”。^②英国的马克思主义考古学家 V.G. 柴尔德在其《人创造了自己》一书中，总结了史前的发展规律：人类从食物采集到新石器时代革命；从城市革命再到人类知识的革命，揭示了人类从蒙昧走向野蛮，从野蛮走向文明的发展规律。因此，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考古学的重要任务是，通过发掘或发现的古迹、古物等研究，以揭示历史上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物质、精神的生活方式及其发展的规律。

（二）埃及考古学研究的范围、对象与意义

埃及考古学作为国别考古学或区域考古学，是世界考古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埃及考古学，其空间范围北起地中海沿岸，南至现在的苏丹，西自利比亚，东至红海沿岸，包括了东北非和亚洲的西奈半岛。在这样一个空间范围内，埃及的考古学根据地理环境的不同，可以划分成三大不同类型的地方区域考古学：尼罗河流域考古、三角洲考古、东西沙漠与绿洲的考古。这三大类区的考古工作，都发现了各具特点的文物与古迹，并且不断地充实埃及考古学的内容。

埃及考古学的时间范围，包括三大时代：史前时代、法老时代和希腊罗马统治时代。史前考古学，其涉及的年代起自大约

① C. W. Meighan, *Archaeology: An Introduction*, p.1.

②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卷，第64页。

一百万年前的古埃及人的产生，终止于公元前 4000 年代中叶埃及文明的诞生。法老时代的考古学，从埃及文明的开端至公元前 332 年马其顿亚历山大的征服埃及为止，包括了埃及法老统治的整个时代。从公元前 332 年马其顿希腊的征服，到罗马、拜占庭统治时代的埃及考古学，传统上属于希腊、罗马考古学的范畴，但我们把它划入埃及考古学的范围之内，所以埃及考古学的下限应该是以公元 641 年的阿拉伯的征服为止。因此，我们今天所要谈论的埃及考古学，其年代学范围比传统上的埃及考古学延长了将近一千年之久（详见下文）。

埃及考古学研究的对象，其内涵非常丰富。就史前埃及考古学而言，主要是根据遗址、遗物和遗迹（村落、工具、武器、器皿、生活垃圾等）研讨古埃及人的起源问题，包括其人种的来源和语言系统的归属问题，以及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特别是他们如何从野蛮时代过渡到文明时代的重要历程。

法老时代，也可以说是埃及王朝时代。法老时代的考古学是埃及考古学最重要的一个阶段，也是考古内容最丰富的阶段。其主要内容涉及法老时代的遗址、遗迹和遗物，主要包括村落、城镇、矿山等遗址和王宫、陵墓、寺庙、堡垒等建筑。还有不同时期遗留下来的工具、器具、武器以及雕像、浮雕、绘画等艺术品以及纸莎草纸文献与碑铭等。作为埃及特有的木乃伊尸体，往往也成为我们了解古埃及人的生活、丧葬习俗以及医学等方面的重要内容和依据。

除了法老时代丰富的文物与古迹之外，希腊、罗马统治埃及的时代，仍然留下不少值得考古发掘和研讨的遗物与遗迹。特别要提到的是，希腊、罗马统治时代埃及的寺庙建筑与艺术创作的风格，以及陵墓与木乃伊制作的演变、城市的发展等。这不仅保留了埃及传统固有的文化特点的遗产，而且还展示了希腊、罗马文化的影响，大大地丰富了埃及考古学的内容。

• 研究埃及考古学的重大价值与意义，首先在于埃及是世界上最早的文明摇篮之一。当欧洲人还在到处流浪之际，古埃及人与

西亚的苏美尔人率先踏入文明社会。我们可以通过埃及考古的遗址、遗物、遗迹来发现最古老的文明是怎样起源与发展的；其二，古埃及文明是古代世界历史最悠久的文明，从前王朝的诸王到希腊、罗马时代，古埃及文明先后延续了四千多年之久，即有本土的法老王，又包括异国帝王的统治。所以埃及考古学所涉及的时间、空间范围是广泛的，最具典型意义；其三，古埃及文明的遗产是世界上遗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它的历史文化遗址占全世界遗址总量的三分之一。由于埃及考古学年代持续最长，物质遗迹、遗物丰富，特别是埃及干燥的自然环境有利于有机物和无机物的地上地下文物、遗迹的保存，所以，埃及考古学具有发掘不尽的、丰富的考古资源，为世界考古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其四，埃及考古学是埃及学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它的发展必将进一步影响和推动埃及学的发展。

（三）新世纪埃及考古学研究的新课题与新手段^①

伟大的 20 世纪已成为历史。埃及的考古工作从 1798 年拿破仑远征埃及，带领一批东方学家到达埃及开始，至今已有两个世纪之久。除了埃及本国的考古学者之外，英、德、法、美等国的考古学者先后来到埃及，长期从事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在现今大约有一百个不同国家的考古学者先后到埃及进行了发掘工作，取得了一些重大的研究成果。但是，以往的发掘并非完全是科学的，而且还有些空白区，包括中埃及的部分地区，沙漠绿洲以及上埃及的南部。^②当我们刚刚迈入 21 世纪的时候，除了总结以往的考古学成就之外，展望新世纪埃及考古学的前景，特别是新世纪为埃及考古学提出的新课题和新的研究方法与手段，也是十分必要的。

新的世纪，21 世纪是知识经济的时代，信息的时代，科学技术，特别是高科技突飞猛进的时代，传统的埃及考古学必然会遇到新的冲击与新的挑战。我们不能预测到整个 21 世纪埃及考古学的巨大发展，但至少可以在新世纪来临之际，展望埃及考古学研究所面临的新课题，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新的研究方法与手段。

^① 转引自刘文鹏：《埃及考古学的研究与展望》，《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01 年第 1 期，第 4-6 页。

^② ed. R. Schulz and M. Seidel, *Egypt, The World of the Pharaohs* (EWP), Könemann. 1998, p.499.